

# 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研究述评

李喜霞

(西安文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研究,有一批精辟论述,其视域主要集中于近代著名人物慈善思想、西学与中国近代慈善思想关系、近代慈善动因、“以教代养”思想、近代慈善组织思想五个方面。纵观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还应进一步的开展,其一,近代慈善思想与传统的和西方的慈善思想应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其二,“以教代养”问题的研究要逐步深入;其三,对社会大众这一层面慈善思想的探讨要得到重视。

【关键词】慈善 思想 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5)10-0132-06

DOI:10.16745/j.cnki.cn62-1110/c.2015.10.033

慈善事业包括慈善活动和慈善思想,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对慈善活动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出版了大量的作品,学界对其内容的整理和评论比较多。相较于慈善活动,慈善思想,特别是近代中国的慈善思想的研究述评,却少有人问津。针对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研究,虽然数量相对少,但不乏精辟论述,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有利于中国慈善史研究的深化。

从近代慈善研究的历史序列来看,民国初年,已有学者对当时的慈善思想展开研究。1912年朱友渔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其博士论文《中国慈善思想——基于互助目的的研究》。该文论述到近代中国民间的慈善行为仍具有很明显的偶发性,并严重依赖于慈善者个人的德行,体现出浓厚的互助思想和主动救助的理念。<sup>[1]</sup>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是另一部涉及到慈善思想问题的著作。此书就中国灾荒的成因,救荒政策的形成、措施的演变进行论述,形成了一部较为完整的、有关灾荒救济方面的著作。由于著述的主题所及,该书就历朝救济思想和理论有所讨论,提出了“天命主义之襁褓论、消极之救济论和积极之预防论”<sup>[2]</sup>等论点。除上述著述外,民国时期诸多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其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慈善思想。陈凌云撰写的《现代各国社会救济》一书,提出近

代救济事业应急求改变过去消极的慈善布施,成立积极的“互助”和“公共责任”之观念<sup>[3]</sup>。柯象峰编著的《中国贫穷问题》,对世界各国所提出的贫穷原因论进行了介绍,提出了中国贫穷的原因所在<sup>[4]</sup>。马君武编撰的《失业人及贫民救济政策》,对失业及贫穷原因做了分析<sup>[5]</sup>。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并没有把中国近代慈善思想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慈善思想的研究并没有从慈善具体活动研究的领域中独立出来,相关研究多是在对慈善组织或慈善活动的评判中提及慈善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慈善思想研究开始兴起,这种研究首先是从近代著名人物的慈善思想开始的。

## 一、近代著名人物慈善思想研究

1995年,周秋光《论熊希龄的社会慈善观》在台湾发表,作者对熊希龄慈善救济观念产生和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文章认为熊希龄慈善思想的形成“完全是时代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结果”<sup>[6]</sup>。同时作者强调在熊希龄慈善思想的内容中,含有浓厚的传统慈善思想。赖进兴指出,余治的慈善教化理念,便是“主张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基础,革新教化工作”<sup>[7]</sup>。经元善是近代著名慈善家,对其慈善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朱英提出,经元善的慈善公益思想,集中体现在兴办近代学堂论和通过

\* 本文为2015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陕西近代宗教慈善事业研究”;西安文理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经费资助;陕西省专门史重点学科经费资助。

\* 作者简介:李喜霞(1977—),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创办“劝善看报会”进行善念的扩充,从而实现“开风气,正人心”的理念。就经元善的救荒思想,朱英认为在晚清出现新的观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经元善认为,在以往的灾荒救济举措中,大都是遭遇灾荒后的临时募捐赈济,他指出“这种做法多有弊端”,这种救荒只救急,不能产生根本的救助,实际上“救急不如救贫”,应提倡治本之策;其二经元善提出,救荒是“善举之惠”,但“应从一身及至一家,从一时及至永久”<sup>[8]</sup>。这些救荒思想实质也是经元善的义赈思想。经元善的义赈思想,其体系是复杂的,孙玉敏等人指出,在经元善的义赈思想中,儒、佛、道的观念均夹杂其中。在复杂的思想体系下,经元善提出官赈、义赈可同时并举的理论主张。李念庆的研究表明,在经元善的慈善思想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慈善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轨迹,尤其其他仿效西方诸国兴办近代新式学堂,从重养轻教演变为教养兼施,都明显的体现出近代慈善思想的特点。在他对经元善慈善思想的研究中,把其慈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1860至1880年,以传统乐善好施为基础的早期慈善观;1880至1895年,从消极的赈济思想到积极的防灾思想转变;1896至1902年,从传统的慈善观向近代社会公益思想转变。作者指出经元善的慈善思想是一个从传统慈善思想到近代公益思想转变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sup>[9]</sup>(P19-26)。文章还对经元善所从事的具体义赈活动进行探析,对其慈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论证。

黄鸿山与王卫平就冯桂芬的慈善思想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在冯桂芬的慈善思想体系中,救助对象的范围与传统慈善思想相比有所拓展,并且其救助办法更加积极,采取了“教养兼施”的救助办法<sup>[10]</sup>。李慧伟的研究指出与经元善类似,郑观应的慈善思想也具有“教养兼施”的特点<sup>[11]</sup>。在杜维鹏的研究中表明,郑观应、孙中山等人则展现出利用科学技术辅助救荒事业的意识,均有意欲利用铁路等近代新生事物,提高救荒效率的观念。<sup>[12]</sup>田毅鹏、周秋光对洪仁玕、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慈善福利理念进行了研究。19世纪50至60年代,太平天国的著名思想家洪仁玕,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关情况作了介绍,并主张在中国实施,其社会福利思想在《资政新篇》中有着具体的体现。田毅鹏认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就其整个的体系和内容看,“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福利事业的基本情况”。他也就清末民初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慈善福利观进行研究,指出此二

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把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和西方社会福利观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系统的社会福利主张”。<sup>[13]</sup>周秋光等人在研究近代慈善事业时,指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有诸多希望中国学习西方慈善制度的表述,他的研究表明洪仁玕是近代中国社会,第一个真正学习西方制度和引进西方社会慈善思想之人,周秋光指出,洪仁玕的慈善思想在近代与传统之间划上了明显的分界线。他同时提出,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主要体现的是恤穷慈善观,而孙中山的慈善福利观,则主要是“从民生问题出发”而形成的。<sup>[14]</sup>

## 二、西学与中国近代慈善思想关系研究

近代中国是一个西学东输的时期,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这些信息对先进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慈善也不例外。关于西学与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关系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

首先,西方慈善的传入方式研究。周秋光在其《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对于这一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教会在华兴办的慈善机构,使中国人直接了解到西方慈善思想。周秋光认为,在最早通商的上海等口岸城市中,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在中国积极开展赈济活动,对中国近代慈善观念的产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西学报刊的传播,使国人对西方各国慈善福利事业有了清晰的了解和认知。三是部分中国人的海外亲身见闻,推动了人们对于慈善的认识。周秋光论述到,与传统的中国慈善相比,西方民间慈善十分发达,同时慈善活动的自发性、无偿性特征明显,这些大大革新了近代中国慈善的理念,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向近代转型。<sup>[14]</sup>

关于传教士的慈善活动对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影响,夏明方等学者在具体的救灾案例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丁戌奇荒”救灾期间,以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教士,首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将西方的赈灾事业引入中国,推动了西方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sup>[15]</sup>还有的学者从华洋义赈会等从事慈善活动的民间组织出发,对西方慈善文化影响这些组织的诞生、形成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这些机构的建立是“西方社会福利思想”<sup>[16]</sup>的产物,其中通过西方报刊传入到中国的西方合作思想,是华洋义赈会建立的“思想基础”。在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意识、社团理念均对其产生深远影响。伴随近代国家意

识的出现,近代社会组织理念被吸纳入慈善思想中。民国时期,西方社团观中的合群结社思想便对华洋义赈会的影响明显。<sup>[17]</sup>伴随着西方互助学说的传入;国际慈善的概念已然出现<sup>[18]</sup>。

### 三、中国近代慈善动因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思想中包含有浓厚的宗教慈善理念。游子安的著作,对明清以来的善书和善人进行系统的介绍和梳理,包括宗教慈善家。作者指出,清末民初的宗教慈善家们,主张以慈善事业“激发人心,维持世道”,民国时期宗教慈善思想仍多以因果劝人以挽回世道人心,并重视家庭中的因果教育。<sup>[19]</sup>何建民认为,在近代“西学东渐和社会转型中兴起的现代人间佛教运动,逐渐形成了以慈善事业作为佛陀教化的根本目的及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和佛教徒作为国民一分子所应尽之义务以及现代佛教救命圈等重要思想传统”。他指出,从个人的“功德报应”观念到“国民一分子”观念的变化,反映出了慈善思想从传统社会的救己到清末民初自觉的救世,从而体现出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近代转化。<sup>[20]</sup>程杨指出,道家的慈善思想,是在原有劝善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近代道教的慈善思想。同时作者着重提出“传统善书中那种善举的实施细则在近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近代道教的慈善思想,除继承以往的道教传统慈善思想的‘忠、孝、慈、仁’以外,更添加了近代中国的现实意义,愈发强调要将这些比较理论性的理念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并在实际的操作中修行”<sup>[21]</sup>。徐顺教等人认为,民国时期佛教徒更盛行“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要求僧侣多注意现实问题,勿纠缠于死后问题的探讨”<sup>[22]</sup>。

近代慈善事业的实施,深刻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影响。周秋光认为,在儒学的思想体系中讲求由“仁”而生“善”,这种“仁”学思想对中国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sup>[23]</sup>。近代著名的慈善家,诸如经元善、张謇、熊希龄等人,其慈善动因中均有着浓厚的仁爱观。李念庆提出,经元善举办的各项慈善活动,就是基于“惻隐之心”<sup>[9](P23-32)</sup>。清末民初的张謇,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朱英的研究表明,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各类慈善公益事业;“全凭自己的良心”<sup>[24]</sup>。周秋光认为熊希龄慈善观的形成,主要基于“真正认识了贫民社会的疾苦”和“对于民国政治的极度痛恶”,从而形成了一种“恩被于物”、“慈爱于人”的慈善观。<sup>[6]</sup>

近代以来,慈善动因发生了变化。李少兵等人

提出,近代慈善实施的动因从传统的“福祸报应”、“因果循环”转变为谋求“完善教养”、“社会进步”的观点<sup>[25]</sup>。近代慈善观念也不再仅仅停留在悲悯和人道的层面,而是提升到“国家的继承者”和将来的主人翁。赵宝爱认为,近代慈善教育担负起了“民族复兴的重任”<sup>[26]</sup>。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往来成为中华大国必须正视的现实,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大家庭去,争取真正的国际平等,成为清末民初慈善界实施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动因。朱浒指出,1877年华北严重的灾荒对江南产生涟漪式的波动影响,大规模饥民的南移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的震动日益明显,再加上西方行动的扩展,使得当时义赈产生的主观因素已在中国传统国家观念之中加入了近代民族国家意识<sup>[27]</sup>。近代慈善机构在进行国际慈善时,一开始就把“慈善援助与塑造大国责任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和改善国际外交环境等结合在了一起”<sup>[18]</sup>。夏涵的研究发现,清末民初在上海绅商的慈善思想动因中,一方面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理念,道教与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仍然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慈善公益思想的输入,他们将“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结合起来”<sup>[28]</sup>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慈善思想的一个来源。

### 四、“以教代养”思想研究

“以教代养”是近代慈善救助的一个重要方式,在乔志强、王卫平、周秋光等人的研究中,都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乔志强强调“教养并重”思想的扩展,完善了社会的救济功能,强化了社会养育和个人生活的有机联系。<sup>[29]</sup>王卫平认为中国古代慈善机构重在“收养”,这种理念和实践,在传统社会表现为仁慈观念,在近代“收养”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教养兼施”成为当时的重要观念,受此理念指导;“以教代养”成为重要的救助方式。<sup>[30]</sup>王玲则分析了这种转变发生的原因,她的研究表明,晚清时期之所以出现教养兼施的救助方式,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其时,一些开明之士开始思考,提出慈善不单是救济社会贫民的活动,和道德教化的场所与手段,要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必先从社会个体的贫穷问题出发,考虑被救济者的“技能与知识培养”,以此提高慈善救助的能效。<sup>[31]</sup>熊希龄也是近代时期提倡教养兼施的一位慈善家,周秋光指出,熊希龄所提出的由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所谓“三合一”的教养之法,

更是对“以教代养”的理性思考,这些理念和思想,充实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慈善教育思想,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sup>[32]</sup>李少兵的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慈善理念和实业救济事业的影响下,北京的传统妇幼救济开始向现代转变。其主要路向有二:一是以“卫道”为救助目标,以“养”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妇幼慈善,开始向强调“教育救济”的现代慈善转变。现代慈善是在“养”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传授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其目的在于使被救助者能够在未来自谋生路和发展,避免再次落入困境。<sup>[33]</sup>

近代以来,社会动荡加剧,游民日益增多,同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输入国内,思想界对于如何解决游民问题,逐渐提出了“推广工艺,振兴实业”的言论。在蔡勤禹的著述中,作者指出当时的思想家们不仅提出要发展机器,还应发展采矿等工业部门,利用新的交通工具,推动救济事业发展。<sup>[34]</sup>谢忠强认为,这种教养兼施的理念,强调“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让受救助者成为劳动力资源,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sup>[35]</sup>。任云兰对传教士所开展的慈善公益事业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传教士进入中国,将宗教活动与慈善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推进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些影响集中表现在慈善救济观念方面。在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慈善出现了教养方面的重大变化——即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转变。她论证到,在西方传教士的慈善实践及其观念影响下,近代慈善救济“更注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和利益的导向”<sup>[30]</sup>。

### 五、近代慈善组织思想研究

晚清时期,民间救荒组织思想出现了诸多变化和发展。洋务运动时期,仁人志士注重利用近代工商事业组织力量发展救荒,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夏明方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在当时,官、商、民多种力量互相结合,救灾备荒体系呈现多元化、社会化,从而使中国救荒理论发生了“革命性转变”<sup>[37]</sup>。蔡勤禹等人认为,华洋义赈会以“建设救灾”“防灾救灾”为指导原则,提出了一套救灾防灾思想,对民国时期救荒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开创性作用。<sup>[38]</sup>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一书。她提出明末时期的慈善组织,为了让组织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成立时必有仔细的规条,并责成会员遵守。梁其姿认为清雍正时,全国各地的育婴、普济及其他的地方救助组织

有了较大规模地增长,在此基础之上清初慈善机构进入制度化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财务正规化、管理制度的合理化两方面。<sup>[39]</sup>蔡勤禹的著述《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一书,从制度层面梳理了民国时期社会救济的立法与设施、行政体制等内容。<sup>[40]</sup>法制化当属制度化思想的应有之意,近代以来随着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慈善法制化的举措颇多。余新忠以义赈与义仓和义庄的兴起为例,说明近代民间社会救济的组织化和制度化<sup>[41]</sup>。曾桂林就民国慈善法的法律渊源、法律结构、运行机制及其实际效果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传统慈善思想为民国时期的慈善立法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借鉴,成为民国政府慈善立法的基本依据与理念”,而西方慈善救济理念与制度的引入与传播,促进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民生主义则成为各项关乎弱者民生的慈善法规的立法理念”。<sup>[42]</sup>另外还有一些著述和文章在其内容中也有对近代慈善组织的思考,著述主要有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周秋光、曾桂林的《中国慈善简史》;王卫平、黄鸿山、曾桂林著的《中国慈善史纲》。论文有毕素华的《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与张益刚《民国社会救济法律制度研究》等。<sup>[43]</sup>

综上所述,近代慈善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对于该内容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首先,近代慈善思想与传统的和西方的慈善思想应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中国近代慈善思想是在传统社会慈善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必然与其有共通之处,但更有其趋新之点。中国近代慈善思想延续了哪些传统慈善思想的内容和观点,与传统社会时期的慈善思想相比,近代又具有什么样的新内容和新特质,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们去探寻和回答。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慈善活动和慈善思想的研究,已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了有益的铺垫。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西方思想源源不断的输入到中国,对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产生重大影响,慈善思想也不例外。目前学者们就这一问题已达成共识,即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深受西方慈善活动和慈善理念的影响。但是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还有待详细论述。

其次,“以教代养”问题的研究并不够深入。在

中国传统社会也存在“以教代养”的现象,而且与近代“以教代养”的模式非常接近,但其实二者相去甚远,近代慈善教养思想的发展有二。一是近代的教养更侧重于被救济者健全人格的养成;二是随着近代大机器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在救助贫民时更多关注的是给予他们生活技能的教授,这种技能学习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呈现出近代慈善思想新的特点。近代“以教代养”的思想,不论在救助的侧重点和救助的目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近代性。清末民初慈善救助针对旧有的“以教代养”方式的不足进行反思,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民国成都市的《社会调查与统计》中记载,民国以前的救济机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为彼辈他日谋生之计,而予以手工艺之”,但这些手工艺并没有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结合起来,也未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因而“收效不著”。<sup>[44]</sup>其他还有如慈善思想中所体现的公民性理念,科技慈善观和分类救济思想,以及慈善制度化中的自律和他律理念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欠缺,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后,目前慈善思想研究的角度和层面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上层人物,忽略了社会大众这一层面慈善思想的探讨。近代慈善家的思想研究是目前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的领域。近代慈善家的思想研究对于慈善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已有诸多研究成果问世。但笔者将近代慈善思想家的研究成果进行数量统计后发现,如果将慈善思想家按照社会地位和资产多少进行划分<sup>①</sup>,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层慈善思想家,包括经元善、张謇、熊希龄等人。而对于近代慈善思想产生的其他主体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却非常罕见。葛兆光是中国思想史方面重要的研究者,他反思道:“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sup>[45]</sup>,往往只是那些有名望的社会个体或者他们的观念史,才可称作是经典的思想史,这样就忽视了人类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大多数社会个体,他们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主体,也在持续思考社会问题,形成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些思想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它们应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注释:

①慈善思想家可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上层指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身份多为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中下层多指拥有一定的地位或资产,但其社会影响力要小于上层。

参考文献:

- [1] Yu—Yue TSU, M.A. 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a Study in Mutual Aid, Columbia University [D]. 1912: 42, 113-114.
- [2]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199-264.
- [3] 陈凌云. 现代各国社会救济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291.
- [4] 柯象峰. 中国贫穷问题 [M]. 上海: 中正书局印行, 1935: 85, 129.
- [5] 马君武. 失业人及贫民救济政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 [6] 周秋光. 论熊希龄的社会慈善观 [M]. 近代中国慈善论稿,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230-241.
- [7] 赖进兴. 江南士绅的慈善事业及其教化理念——以余治(1809-1874)为中心 [D]. 台南: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2005: 59.
- [8] 朱英. 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M].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1): 88-93.
- [9] 李念庆. 经元善的慈善思想与实践 [D]. 2009.
- [10] 黄鸿山, 王卫平.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近代慈善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 [J]. 江海学刊, 2009(1): 7.
- [11] 李慧伟. 郑观应慈善观及其实践 [D]. 2009: 87-95.
- [12] 杜维鹏. 近代救灾思想研究 1840-1931 [D]. 2008: 14-25.
- [13] 田毅鹏.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1(1): 120-126.
- [14] 周秋光, 徐美辉. 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5): 110-115.
- [15] 夏明方. 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 [J]. 近代史研究, 1993(2): 21-36; 任云兰. 传教士与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 [J]. 理论与现代化, 2007(2): 121-124; 谢志强. 官赈”、“商赈”、与“教赈”: 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0(2): 122-127.
- [16] Andrew James Nathan;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70. 转引自蔡勤禹著. 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引言 2.
- [17] 薛毅.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237; 蔡勤禹. 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33-45.
- [18] 赵宝爱. 民初中国的国际慈善思想及实践 [J]. 求索, 2006(11): 224-226.
- [19] 游子安著. 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71.
- [20] 何建明. 中国佛教慈善思想的现代传统 [J]. 中国哲学史, 2009(3): 108-115.
- [21] 程杨. 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 [D]. 2010: 16.
- [22] 徐顺教, 李甄馥.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293.
- [23] 周秋光, 曾桂林. 中国慈善简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 29.
- [24] 朱英. 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 [J]. 江汉论坛,

2000(11):59-64.

- [25] 李少兵,王明月.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的个案分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2):127-133.
- [26] 赵宝爱.慈善救济事业与近代山东社会的变迁——1912-1937[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77.
- [27]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6.
- [28] 夏涵.清末民初上海绅商阶层慈善公益思想及活动研究[D].2012:34-41.
- [29]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82.
- [30] 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J].江苏社会科学,2005(1):212-217;另在蔡勤禹、李元峰的《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和陈桦的《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等文章中,有相似观点.
- [31] 王玲.从《申报》(1872—1911)的慈善文论看晚清慈善思想的变迁[D].2004:12-34.
- [32] 周秋光.论熊希龄的慈善教育思想[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3):20-26.
- [33] 李少兵,王明月.“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的个案分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2)127-133.
- [34] 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71.
- [35] 谢忠强.民初沪上慈善事业兴盛原因初探[J].船山学刊,2006(4):205-207.
- [36] 任云兰.传教士与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J].理论与现代化,2007(2):121-124.
- [37] 夏明方.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构想及其历史地位——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三[J].北京档案史料,2002(2):23-34.
- [38] 参见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薛毅著.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刘招成.华洋义赈会的农村赈灾思想及其实践[J].中国农史,2003(3).
- [39]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2;99-122.
- [40] 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41] 余新忠.遗失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救济[J].21世纪经济报道,2008-6-2.
- [42] 曾桂林.民国时期慈善法制研究[D].2009:45.
- [43] 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王卫平,黄鸿山,曾桂林.中国慈善史纲[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毕素华.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3(6);张益刚.民国社会救济法律制度研究[D].2007.
- [44] 社会部统计处编印.成都社会概况调查[G].1944:117-185.
- [45]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4.